

性格优势与美德研究的现状、困境与出路*

段文杰¹ 谢丹^{**2} 李林³ 胡卫平²

(¹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 武汉, 430072) (² 陕西师范大学现代教育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西安, 710000)

(³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 性格优势和美德是源于“价值实践分类体系”同一架构中不同层次的概念。过去十年的研究表明性格优势对个体身心健康和幸福感有积极贡献。但目前该领域绝大多数研究着眼于性格优势, 而忽略了该体系中更普遍、更核心的美德。美德的结构差异性可能阻碍了相关研究的进行和比较。本文认为“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方法”可能是解决途径之一, 并引用已有研究进行佐证, 发现亲和力、生命力和意志力可能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美德结构。

关键词 美德 性格优势 价值实践分类体系 中文美德问卷 积极心理学

1 引言

美德 (virtues) 是全人类普遍赞赏的品质, 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尽管美德在各种文化、宗教、民族甚至个体之间存在差异, 但它是全人类所普遍向往的 (Cawley, Martin, & Johnson, 2000)。然而, 传统的“美德”研究多存在于哲学和伦理学领域, 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近十年来, 在积极心理学思潮的影响下, 科学有效的实验和测量手段使得人们相信美德是全人类所普遍具有的积极力量 (Seligman & Csikszentmihalyi, 2000; Seligman, Steen, Park, & Peterson, 2005)。

国内已有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进行过综述, 张宁和张雨青 (2010) 总结了性格优势跨文化的普遍性、对健康和幸福的积极贡献, 以及年龄性别差异等问题; 而段文杰、李婷婷和张永红 (2011) 则将重点放在了性格优势和美德的测量工具 (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VIA-IS) 上, 并对此工具的信效度进行了检验与述评 (段文杰, 白羽等, 2011)。这些实证研究大多以 2009 年前的横断研究为重点, 详细讨论了“价值实践分类体系”中的性格优势 (character strengths), 而忽略了美德。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研究偏差 (research bias) 是本文着力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因此, 本文在简述理论背景的基础上, 重点回顾发展及干预领域的新进展, 指出目前该领域存在的研究偏差, 并针对其原因及解决办法进行讨论, 力求为积极品质研究呈现一个全新的面貌, 进而为丰富其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提供思路。

2 基础: 价值实践分类体系

“价值实践分类体系” (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是由 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 参照《精神疾病诊断和分类手册》和《国际精神障碍与行为问题诊断标准》提出的研究人类积极力量和品质的基本框架。他们认为, 只要在适当的抽象层面去寻找, 就肯定能找到人类文化中共同的、甚至可能植根于基因中的美德 (ubiquitous virtues)。因此, 美德是通过自然选择的作为解决种族生存和繁衍等重大问题的必要手段 (Dahlsgaard, Peterson, & Seligman, 2005; Peterson & Seligman, 2004)。

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 邀请全世界 50 多位杰出的青年心理学家从对人类社会影响最为广泛的哲学、宗教和文化体系中, 提取了全人类普遍具有的 6 大美德; 然后通过“十条标准”进一步遴选出培养这些美德的 24 项性格优势 (见图 1), 国内已有文献对这一分类体系及标准进行了介绍

* 本研究得到积极心理学研究基金项目 (京民基证字第 0020344 号 2015-01-047) 和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学者学术发展计划学术团建设项目“幸福科学与积极教育”的资助。

** 通讯作者: 谢丹。E-mail: olga1991@163.com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160433

(段文杰, 李婷婷等, 2011; 何敏贤, 袁雅仪, 段文杰, 2014; 张宁, 张雨青, 2010)。培养并实践 24 种性格优势是获得核心美德的途径, 而美德是获得幸福、健康且有意义人生的关键 (Peterson & Seligman, 2004)。这一框架不仅为心理学家提供了一套具有多重文化背景且相对科学完善的分类体系, 也为研究者和普通大众在探讨与交流人类美德的问题上提供了一致的术语 (Duckworth, Steen, & Seligman, 2005)。随后, Peterson, Seligman 和 Park 等人先后编制了价值实践优势问卷 (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VIA-IS) 和青少年价值实践优势问卷 (Val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for Youth,

VIA-Youth)。这些问卷的基本结构、信效度指标和计分方式等在之前的综述中都有论述 (段文杰, 李婷婷等, 2011; 张宁, 张雨青, 2010)。在 VIA 及 VIA-IS 创立之初, 研究者就认为它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需要根据未来的实证成果不断地修订和完善 (Peterson & Seligman, 2004)。最近, 美国 VIA 性格研究院根据近 10 年 (2004 ~ 2013) 对性格优势的研究成果和研究者的反馈, 重新修订了 VIA-IS 和 VIA-Youth。在保持 24 项性格优势和 6 大美德基本结构不变的基础上缩减题量, 新增了 120 个题目的缩减版 VIA-IS-120、72 个题目的精简版 VIA-IS-72 和 96 个题目的 VIA-Youth-96 这 3 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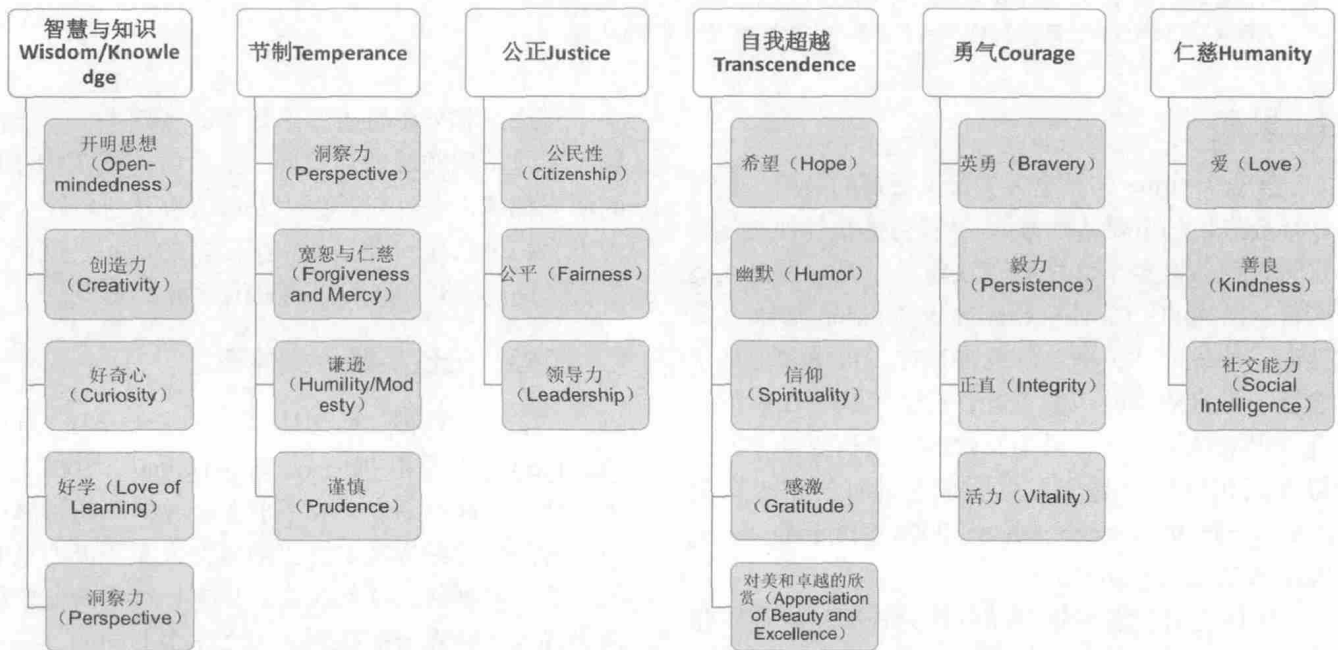


图 1 性格优点与美德结构图

3 现状：“重”性格优势，“轻”美德

世界各地的研究者以这些标准化测量工具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以往的横断面研究发现, 性格优势与生活满意度/快乐、工作满意度、主观幸福感、一般心理健康、创伤后成长、学业成就和组织发展等变量显著正相关 (段文杰, 李婷婷等, 2011; 张宁, 张雨青, 2010; Niemiec, 2013)。最新研究进一步发现性格优势与自尊 (Macaskill & Denovan, 2014)、积极工作体验 (Harzer & Ruch, 2013)、心理弹性 (Hutchinson, Stuart, & Pretorius, 2011)、健康行为 (Proyer, Gander, Wellenzohn, & Ruch, 2013) 和生命质量 (Proctor, Maltby, & Linley, 2011) 等健康心理变量密切相关。

此外, 性格优势对青少年的积极成长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Park 和 Peterson (2006) 认为孩子的性格优势是家庭正向环境特质的反映, 它能够促进幸福感, 抵御心理障碍。Gillham 等 (2011) 发现他人导向优势 (如善良、合作等) 较高的青少年未来会表现出较少的抑郁症状, 而自我超越导向优势 (如爱与被爱的能力、信念等) 较高的个体在将来会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在中国, 段文杰等 (2012) 发现积极养育方式、性格优势对孩子的心理和谐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 其中性格优势的预测贡献率约为积极养育方式的 1.9 倍。因此通过各种策略在家庭和学校环境培养并增强青少年的性格优势是有益的, 能够使他们在提高抵御心理问题和疾病能力的同时, 获得较高的正向体验和更为丰富的生活意义。

(Hutchinson et al., 2011)。

一些干预研究则有力地证明了性格优势对个体身心健康和幸福感的促进作用。Seligman 等人设计并实施的“识别并运用个人性格优势”干预策略被认为是提高幸福感和丰盈人生的最佳方案。六个月的每月一次的测试结果表明，“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运用自己的突出优势”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幸福感、减少抑郁症状 (Seligman et al., 2005)。但是，该研究没有控制参与者预期 (participants expectation)。Duan, Ho, Tang, Li 和 Zhang (2014) 在中国校园环境中改进了该干预范式，更好地分离安慰剂效应。18 周的干预结果发现，在排除参与者预期后，仅来自优势训练组的参与者能够获得持续稳定增长的生活满意度体验。以这些研究为基础，研究者们设计了一系列基于学校、社区，甚至国家层面的更为宏观的“性格优势提升计划”，如“优势健身房 (strengths gym)” (Proctor, Tsukayama et al., 2011)、“建造未来希望 (building hope for the future)” (Marques, Lopez, & Pais-Ribeiro, 2011)，和“瑞士性格优势项目 (zurich strengths program, Z.S.P)” (Proyer, Ruch, & Buschor, 2013) 等。这些项目旨在通过“不断实践 (practice)”和“有为之 (intentionally)”两个“持续幸福感模型”中的关键要素，不断提升参与者的幸福感和身心健康 (Lyubomirsky, Sheldon, & Schkade, 2005)。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的研究都聚焦于积极品质性格优势层面，却忽视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美德层面，形成了很明显的研究偏差 (何敏贤等, 2014; Ho, Duan, & Tang, 2014)。在价值实践分类体系中，没有理由将研究仅仅侧重于一个层次而忽视另一个层次。究其原因，可能是美德的结构差异性阻碍了相关研究。

4 困境：美德的结构差异性

虽然“价值实践分类体系”及其相应的测量工具均在理论上认为 24 种性格优势可以聚合为 6 大美德，但到至今没有任何实证研究支持这一点。Ho, Duan 等 (2014) 梳理了德国、美国、印度、克罗地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非洲地区研究者基于“价值实践分类体系”所探索出的美德基本结构，均得出一个比较简单的结构 (2~5 因子)，少于理论构想的 6 种美德。比如目前最接近 6 因素理论模型的是 Peterson 等人探索出的五大因子：克制类美德、

智力类美德、人际类美德、情感类美德和灵性神学类美德，分别对应于 6 个核心美德中的节制美德、智慧与知识美德、仁慈和公正美德、勇敢美德及超越美德 (Peterson, Park, Pole, D'Andrea, & Seligman, 2008)。克罗地亚 Brdar 等人采用同样的方法，调查了 881 名在校大学生，探索性因素分析得出人际优势 (interpersonal strengths)、坚毅 (fortitude)、活力 (vitality) 和谨慎 (cautiousness) 4 个因素 (Brdar & Kashdan, 2010)。再如 Shryack 等人探索出一个 3 因素模型：自恃 (self-assuredness)、社交 (sociability) 和自觉性 (conscientiousness) (Shryack, Steger, Krueger, & Kallie, 2010)。

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有两点。

第一，各个美德与性格优势之间缺乏清晰的界限 (Kristjánsson, 2010)。Kristjánsson (2010) 认为 Peterson 和 Seligman (2004) 所提出的 VIA 分类体系中，美德可以被认为是“核心美德” (cardinal virtues)，而性格优势则是“亚美德” (sub-virtues)，两者可能仅仅是“量”而非“质”的区别。Schwartz 和 Sharpe (2006) 还认为 VIA 分类体系无论在理论构念上还是在概念结构上，都没有直接、正式、详细地给出性格优势与美德之间的关系，这样就为美德的二级分类带来了诸多问题和矛盾。Fowers (2005) 进一步指出，VIA 对性格优势和美德的二级划分忽略了美德发展的整体性，实际上美德只有整体和谐地发展才能与人类的生活生动具体地衔接起来。语义分析清楚地揭示出部分元素之间存在不易区分的现象。如勇气 (courage) 是 6 个核心美德之一，而勇敢 (bravery) 是 24 项性格优点之一，研究者很难严格划分勇气与勇敢之间的界限。由此可见，性格优势与美德可能只是同一概念在不同“量”上的表现。

第二，不同的文化对表现同一美德和性格优势题目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 (Ho, Rochelle et al., 2014)。比如，“我从来不对外人讲我们团队的坏话”，这在大多数集体主义文化下的中国人看来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社会预期，因此该题对测量公民性或团队精神就会丧失一定的敏感度；又比如“我会践行我的宗教信仰”，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给予此题的分数都非常低，因为该题不符合中国大陆“无神论”的社会环境；再比如“当我听到有人说卑鄙的事情时，我会提出抗议”，这在个人主义文化下，会反映出

个体勇敢的性格优势,而在崇尚人际和谐的华人社会,很少有人这么做。这直接导致了这些题目虽最大程度上囊括了性格优势的各个方面,却不一定在各个性格优势上都是核心题项,也不是最核心、最贴切的描述,即其载荷量也不一定高(何敏贤等, 2014)

5 出路: 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

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跨文化研究中的等价性。建立概念等价性和测量等价性是在不同文化群体中进行该类研究的先决条件。目前,将标准化的工具应用于其他语言和文化环境时,通常采用直译—回译法,而这种简单的方法并不能同时考虑到概念、度量标准、功能和语言上的等价性问题(Kankaraš & Moors, 2010)。

社会行为科学通常用两种方法来检验文化对个体行为和心理的影响:一是主位研究(emic perspective of ethnographers),倾向于以一种“立足本土的视角”来描述本位文化(Malinowski, 1922);二是客位研究(etic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ists),认为文化的外部因素远比其“内部”特点重要(Harris, 2001)。这两种方法各有其优势与缺陷,所以研究者提出了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的方法(the combined emic-etic approach)来发展具有跨文化特性的研究工具(Ho, Duan et al., 2014; Ho, Rochelle et al., 2014),此方法具有两个显著优势:一是使得具有“文化共通性”的题项能够与现存的西方文化下的工具具有“可比性”,而“文化特殊性”题项可以使这一工具的生态效度最大化(Cheung, van de Vijver, & Leong, 2011);二是此方法得出的结论可以在其他文化中进行检验,因此可以发展出适用范围更广的概念或理论(Ho & Cheung, 2007)。

Duan, Ho等(2012)采用此方法,修订了VIA-IS中文版,形成了包含96个题项的中文美德问卷(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CVQ)。探索性因素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该量表可以测量亲和力和(relationship)、生命力(vitality)和意志力(conscientiousness)三大美德。进一步的心理学检验发现,三个分量表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和重测信度,并且在男性与女性、学生与工人、成年人与青少年、中国大陆被试与中国香港被试等亚群体上表现出较稳定的因子结构(Duan, Bai et

al., 2012; Duan, Ho, Bai, & Tang, 2013; Duan, Ho et al., 2012; Zhang, Duan, Tang, Gan et al., 2014)。随后的研究表明亲和力和、生命力和意志力与希望、感恩、生活满意度、殷盛、心理韧性、创伤后成长等积极心理变量显著正相关,与抑郁、焦虑、创伤后应激障碍、知觉到的压力、总症状指数、病理性互联网使用等消极心理变量显著负相关(Duan, Bai et al., 2012; Duan & Guo, 2015; Duan, Guo, & Gan, 2015; Duan et al., 2013; Duan, Ho, Siu, Li, & Zhang, 2015; Tang, Duan, Wang, & Liu, in press; Zhang, Duan, Tang, Gan et al., 2014)。最近一项表达性写作(expressive writing)干预研究发现,高生命力组的参与者能够获得显著的生活满意度改善,且其增长幅度显著高于低生命力组(Yang, Tang, Duan, & Zhang, 2015; Zhang, Duan, Tang, & Yang, 2014),这暗示个人美德可能会增进部分干预手段的疗效。这些结论虽然有限,但基于美德对个体身心健康和幸福的潜在贡献,相信随着越来越多实证研究的开展,个人美德在健康科学领域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

6 展望

关于美德的研究刚刚起步,未来的研究应该着重关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美德与性格优势的关系。根据两者关系的争论及近10年的实证研究,有一定理由质疑“美德”与“性格优势”的分类与界限。因此,两者在概念上可能不是远离的,反而是相近,甚至是类似的,都是个体的“积极心理品质”或“积极心理资源”。在韦氏词典中,“virtue”除了被解释为“道德上的卓越(美德)”外,还被认为是一种值得称道的“品质或特性(长处)”。本文仍采用“美德”这一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的具有中西文化的共通性的翻译,为跨文化的比较和研究提供基础。但未来研究需要在明确“性格优势”与“美德”的关系后,寻求一个更为确切的术语。

第二,美德的内部结构。目前,性格优势与美德研究主要是由西方积极心理学家发起并进行的,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以“价值实践分类体系”为基础。因而研究范式也多受到西方文化的“个人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的影响(Lazarus, 2003),但并非所有的文化都重视这样的思想,甚至有些文化并不认同这样的价值观(Banicki, 2014)。因此,目前的分类体系是否遗漏了某些美德还不得而知,需要进一

步去研究。正如，彭文会和黄希庭（2013）所述，未来的研究可能要超越“价值实践分类体系”的范畴，进一步探索个体美德的基本结构。

第三，美德的外部效度。通过兼顾文化共通性与文化特殊性所获得的美德结构可能具有普遍性和跨文化一致性。最近 McGrath (in press) 基于心理和文化的整合视角，使用不同的测量工具探索美德的真正结构。结果发现，1070549 个英国样本表现出与此类似的三大美德：关爱（caring，对应于亲和力）、求知欲（inquisitiveness，对应于生命力）和自我控制（self-control，对应于意志力）。但是，这些仅仅是间接证据，未来还需要进行更为直接的跨文化研究和分析更为严格的跨样本，进一步检验因子不变性。

第四，美德研究的方式方法。在美德结构的研究中，自陈式问卷测量是主要形式，因素分析是主要方法，它们对于理解美德有重要作用；但若深入理解美德的特点，获得一致且稳定的美德结构，则有必要采取更加多元化的研究形式和方法进行交叉验证。未来研究可考虑纳入更多的典型案例访谈、行为观察等质性研究方法，对由因素分析所获的美德基本结构进行补充完善；运用横断研究和纵向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式，基于个体发展历程来考察美德的发生与发展；引入行为遗传学和神经生物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从基因表达和神经生理结构上进一步探索美德结构的生物学基础。

第五，美德的积极功能与基于美德的干预策略。美德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帮助个体获得能够提高健康与幸福的能力，因此，美德不仅仅是一个结构，更是一个过程（喻丰，彭凯平，董蕊，柴方圆，韩婷婷，2013），研究者在研究其结构的同时，也应该探究这些品质与其他心理变量（如注意偏向、记忆、情绪情感等）和情境的相互作用，比如拥有不同美德的个体，在面对同样压力情境时会有怎样不同的表现等。以中国大学生为对象的初步研究发现，在面对日常压力时，具有高生命力的个体通常知觉到较小的压力，并表现出较少的身心症状；而具有高意志力的个体无论在何种压力环境下，均表现出较少的身心症状（Duan, Ho et al., 2015）。未来研究可以在此基础上开发出能够帮助个体增强这些积极品质或运用这些积极品质抵御不良情境的干预手段。

参考文献

段文杰，白羽，张永红，唐小晴，王志章，李婷婷. (2011). 优势行动价值

问卷 (VIS-IS) 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4), 473-475, 478.

段文杰，李婷婷，张永红. (2011). 优势行动价值问卷及其应用研究进展.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2), 205-208.

段文杰，张永红，李婷婷，唐小晴，段天宇. (2012). 父母养育方式、性格优势对心理和谐的影响. *心理学探新*, 32(2), 183-187.

何敏贤，袁雅仪，段文杰. (2014). 发现自己的抗逆力：正向心理学的应用与技巧. 中国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彭文会，黄希庭. (2013). 美德幸福观：一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话题.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9(4), 220-225.

喻丰，彭凯平，董蕊，柴方圆，韩婷婷. (2013). 道德人格研究：范式与分歧. *心理科学进展*, 21(11), 1-10.

张宁，张雨青. (2010). 性格优点：创造美好生活的心理资本. *心理科学进展*, 18(7), 1161-1167.

Banicki, K. (2014). Positive psychology o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disquieting suggestion. *New Ideas in Psychology*, 33, 21-34.

Brdar, I., & Kashdan, T.B. (2010).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well-being in Croatia: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tructure and correlat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 Personality*, 44(1), 151-154.

Cawley, M. J., Martin, J. E., & Johnson, J. A. (2000). A virtues approach to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8(5), 997-1013.

Cheung, F. M., van de Vijver, F. J., & Leong, F. T. (2011). Toward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ersonality in cultur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6(7), 593-603.

Dahlsgaard, K.,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P. (2005). Shared virtue: The convergence of valued human strengths across culture and history.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9(3), 203-213.

Duan, W., Bai, Y., Tang, X., Siu, P. Y., Chan, R. K. H., & Ho, S. M. Y. (2012). Virtues and positive mental health. *Hong Kong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38(5), 24-31.

Duan, W., & Guo, P. (2015). Association between virtues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a Chinese community sample after earthquake. *PeerJ*, 3, e883.

Duan, W., Guo, P., & Gan, P. (2015). Relationships among trait resilience, virtues,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PLoS ONE*, 10(4), e0125707.

Duan, W., Ho, S. M. Y., Bai, Y., & Tang, X. (2013).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3(3), 336-345.

Duan, W., Ho, S. M. Y., Bai, Y., Tang, X., Zhang, Y., Li, T., & Yuen, T. (2012).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22(6), 680-688.

Duan, W., Ho, S. M. Y., Siu, B. P. Y., Li, T., & Zhang, Y. (2015). Role of virtues and perceived life stress in affecting psychological symptom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Journal of American College Health*, 63(1), 32-39.

Duan, W., Ho, S. M. Y., Tang, X., Li, T., & Zhang, Y. (2014). Character strength-based intervention to promot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context.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5(6), 1347-1361.

Duckworth, A. L., Steen, T. A., & Seligman, M. E. P. (2005). Positive psychology in clinical practice. *Annual Review of Clinical Psychology*, 1, 629-651.

Gillham, J., Adams-Deutsch, Z., Werner, J., Reivich, K., Coulter-Heindl, V., Linkins, M., et al. (2011). Character strengths predict subjective well-being during adolescence.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6(1), 31-44.

- Harris, M. (2001). *Cultural materialism: 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 New York, NY: AltaMira Press.
- Harzer, C., & Ruch, W. (2013). The application of signature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positive experiences at work.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3), 965-983.
- Ho, S. M. Y., & Cheung, M. W. L. (2007). Using the combined etic-emic approach to develop a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ese populations. In A. D. Ong & M. v. Dulmen (Eds.), *Oxford handbook of method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pp. 139-152).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 S. M. Y., Duan, W., & Tang, S. C. M. (2014). The psychology of virtue and happiness in western and asian thought. In N. E. Snow & F. V. Trivigno (Eds.), *The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of character and happiness* (pp. 215-238). New York: Routledge.
- Ho, S. M. Y., Rochelle, T. L. R., Law, L. S. C., Duan, W., Bai, Y., Shih, S. M., & Wang, G. L. (2014).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positive psychology research with diverse populations: Exploring strengths among Chinese adults. In J. T. Pedrotti & L. M. Edwards (Eds.), *Perspective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 positive psychology* (pp. 45-57).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B.V.
- Hutchinson, A. M. K., Stuart, A. D., & Pretorius, H. G. (2011).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mperament,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resilience. In I. Brdar (Ed.), *The human pursuit of well-being: A cultural approach* (pp. 133-144).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B.V.
- Kankaraš, M., & Moors, G. (2010). Researching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in cross-cultural studies. *Psihologija*, 43(2), 121-136.
- Kristjánsson, K. (2010). Positive psychology, happiness, and virtue: The troublesome conceptual issues.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14(4), 296-310.
- Lazarus, R. S. (2003). Does the positive psychology movement have legs? *Psychological Inquiry*, 14(2), 93-109.
- Lyubomirsky, S., Sheldon, K. M., & Schkade, D. (2005). Pursuing happiness: The architecture of sustainable change.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9(2), 111-131.
- Macaskill, A., & Denovan, A. (2014). Assessing psychological health: The contribution of psychological strengths. *British Journal of Guidance and Counselling*, 42(3), 320-337.
- Malinowski, B. (192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New York: Dutton.
- Marques, S. C., Lopez, S. J., & Pais-Ribeiro, J. (2011). "Building hope for the future": A program to foster strengths in middle-school student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1), 139-152.
- McGrath, R. E. (in press). 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virtue: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of character strengths.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 Niemiec, R. M. (2013). Via character strengths: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e first 10 years). In H. H. Knopp & A. D. Fave (Eds.), *Well-being and cultures: Perspectives from positive psychology* (pp. 11-29). New York, NY: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 Park, N., & Peterson, C. (2006).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happiness among young children: Content analysis of parental descriptio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7(3), 323-341.
- Peterson, C., Park, N., Pole, N., D'Andrea, W., & Seligman, M. E. (2008). Strengths of character and posttraumatic growth. *Journal of Traumatic Stress*, 21(2), 214-217.
- Peterson, C., & Seligman, M. E. P. (2004).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 Proctor, C., Maltby, J., & Linley, P. A. (2011). Strengths use as a predictor of well-being and 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1), 153-169.
- Proctor, C., Tsukayama, E., Wood, A. M., Maltby, J., Eades, J. F., & Linley, P. A. (2011). Strengths gym: The impact of a character strengths-based intervention on the life satisfaction and well-being of adolescent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6(5), 377-388.
- Proyer, R. T., Gander, F., Wellenzohn, S., & Ruch, W. (2013). What good are character strengths beyond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good character on self-reported health-oriented behavior, physical fitness, and the subjective health status. *The Journal of Positive Psychology*, 8(3), 222-232.
- Proyer, R. T., Ruch, W., & Buschor, C. (2013). Testing strengths-based interventions: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a program targeting curiosity, gratitude, hope, humor, and zest for enhancing life satisfac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4(1), 275-292.
- Schwartz, B., & Sharpe, K. E. (2006). Practical wisdom: Aristotle meets positive psychology.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7(3), 377-395.
- Seligman, M. E. P., & Csikszentmihalyi, M. (2000). Positive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410-421.
- Seligman, M. E. P., Steen, T. A., Park, N., & Peterson, C. (2005). Positive psychology progress: Empirical validation of interventions. *American Psychologist*, 60(5), 410-421.
- Shryack, J., Steger, M. F., Krueger, R. F., & Kallie, C. S. (2010). The structure of virtue: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dimensionality of the virt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48(6), 714-719.
- Tang, X., Duan, W., Wang, Z., & Liu, T. (in press).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of the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flourishing scale. *Research on Social Work Practice*.
- Yang, Z., Tang, X., Duan, W., & Zhang, Y. (2015). Expressive writing promotes self-reported physical,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health among Chinese undergradu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 50(2), 128-134.
- Zhang, Y., Duan, W., Tang, X., Gan, P., Gan, F., & Guo, P. (2014).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in Chinese adolescents.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2(3), 470-474.
- Zhang, Y., Duan, W., Tang, X., & Yang, Z. (2014). Can virtues enhance the benefits of expressive writing among healthy Chinese? A pilot study.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23(5), 231-235.

Current Situati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Studies on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Duan Wenjie¹, Xie Dan², Li Lin³, Hu Weiping²

(¹Department of Sociolog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²Key Laboratory of Modern Teaching Technology, Ministry of Education, 710000) (³School of Psychology,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Virtue is a eternal pursuit across all time and continents in human. However, it was been studied and scrutinized under the scope of philosophy and ethics. That had been impeding the development of virtue until Peterson, Seligman, and their colleagues proposed a system of virtues as a major personal resource for enhancing well-being, 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VIA). The system of virtues consists of 6 core virtues (wisdom/knowledge, courage, humanity, justice, temperance, and transcendence) and 24 character strengths. Corresponding measurements have been developed and tested around the world and across all age group. After more than a decade of researching and investigating, a substantial amount of results about it has proven its true value. Studies have consistently indicated that virtue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character strengths are negatively related to psychological symptoms. Some characteristics based intervention have been proven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human. Various programs in different level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imed to use characteristic as core agents to facilitate the well-being of people. Nevertheless, inconsistency of the structures of the VIA has been demonstrated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possible reason may be that current studies have a strong bias toward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rengths and psychological outcomes. The limited research on virtues may be partly attributed to several issues related to virtue assessment or virtue structure. The cultural invariance of the virtue classification proposed by Peterson et al has recently been examined in different cultures other than the United States; various structures of virtues were obtained. The first issue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2-tier system (virtues vs.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the second is the culture-related understanding of items of different 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The Etic-Emic Approach which is the combination of Emic Perspective of Ethnographers and Etic Perspective of Comparativists was recommended in these multicultural studies, which entail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ross-cultural measurement for ensuring the conceptual equivalence, metric equivalenc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and linguistic equivalence. Generally, it requires identifying the universal items (ie, etic items) first, and then locally relevant items (ie, emic items) are added to the established etic instrument to form a combined and new instrument. Duan, Ho, and their colleagues adopted this approach to reduce the culturally inappropriate items and developed a 96-item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to measure 3 virtues among the Chinese.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nd psychometric evaluation suggested 3 well-established and culturally meaningful virtues, namely, relationship, vitality, and conscientiousness. Subsequent studies implied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three virtues to mental health. Future studies should have five possible directions:(a)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rtues and characteristics, (b) The inner structure of virtues, (c)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virtues, (d) The investigation of virtues,(e) The positive function of virtues and virtue based intervention.

Key words virtues, character strengths, values In action classification, Chinese Virtues Questionnaire, positive psychology